

SW 百花散文书系·古代部分

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王安石

散

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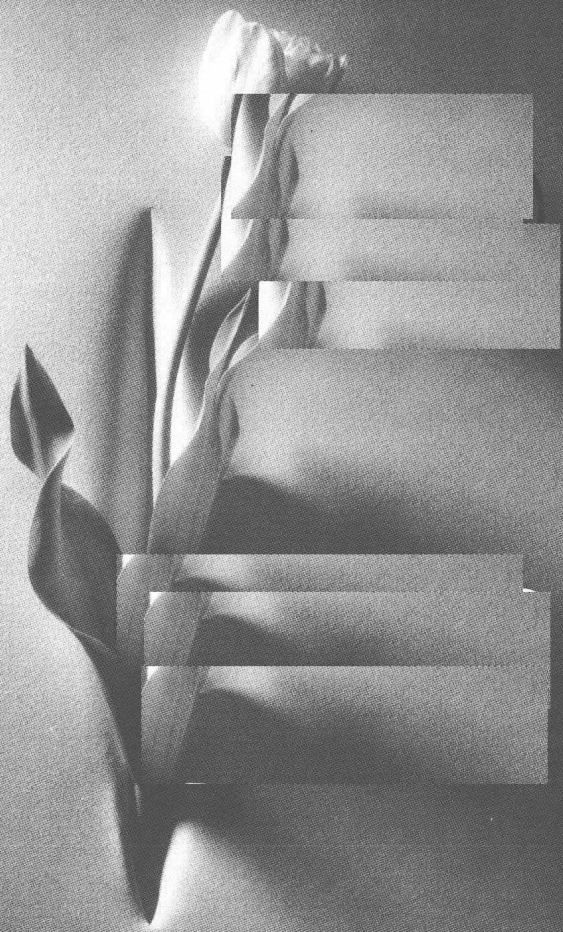


百花散文书系·古代部分

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王安石散文选集

洪本健 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王安石散文选集/洪本健选注; —2 版.—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6
(百花散文书系.古代部分)
ISBN 978—7—5306—5395—1

I.王... II.洪...III.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
—北宋 IV. I 26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629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48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3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1.00 元

编辑例言

一、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它和诗歌一样,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主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古代散文优良传统,以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特编辑这套“中国古代散文丛书”,作为“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

二、散文文体范围,代有嬗变,古今不同。本丛书所选,以抒情、记述体等文学性较强的散文为主。入选作家上起自先秦,下迄于清代。按不同作家分别成册。各书篇目排次,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以便读者了解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演变轨迹。

三、本丛书每书分两部分:一为论文,内容除简介作者生平、文学活动外,着重结合选入本书的作品,分析、评述其散文创作思想特别是艺术特色、散文创作发展历程及影响。一为散文,每篇均附加题解、注释。

四、论文部分力图与散文部分互补共济,以论文帮助

读者对所选散文提高到理性认识,又以所选散文来深化读者对论文的感性认识,两相印证,使本丛书除选注散文佳作供阅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兼具作家论乃至古代散文史的作用,既不同于一般散文选本,也有异于一般的古代散文史而自具独有的特色。

五、每书所选散文,除了作者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外,还照顾到作者不同时期、不同题材、风格的文学性散文,以便体现作者散文创作发展道路。

六、题解除解释文题中有关词语、专门名词等和说明写作时间、出处、版本等外,还对作品写作背景、思想价值、艺术特色以至艺术手法等,加以简明的评述。

七、注释以疏解难字、难词以及典故、职官、器物、人名、地名等为主。对其重要者、用法特殊者,并援引出处或例句,以便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

百花文艺出版社

王安石和他的散文

洪本健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卒谥“文公”，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列宁所称誉的这位“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又是一位以散文和诗歌创作著名的杰出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宋代据六席，江西人占半数，那就是欧阳修、曾巩和王安石。长王安石十四岁的欧阳修，身为北宋文坛宗师，始终关注着曾巩、王安石这两个同乡后学的成长，对他们寄予莫大的期望。他曾对曾巩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见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后来由于曾巩的介绍，他又发现王安石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读了王安石的文章，欧阳修“爱叹诵写，不胜其勤”，将王安石之文编入专收“时人之文佳者”的《文林》中，并且说：“使如此文字不光耀于世，吾徒可耻也！”他也看到王安石文章的不足，请曾巩转告王安石：“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谆谆告诫道：“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以上引文见曾巩《与王介甫

第一书》)欧阳修急切地盼望着与自己十分赏识的这位后生见面。他称赞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欧阳修《再论水灾疏》)。嘉祐元年(1056),当他终于跟自己备加关爱的后生相见时,兴奋不已,其所作《赠王介甫》诗云: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

李白(“翰林”)、韩愈(“吏部”)的狷介放达以及他们在诗文创作上的成就,令欧阳修深为钦服,他以两位大师之不凡的文学成就勉励王安石。对欧公的热情奖掖,王安石自然十分感激,他在《奉酬永叔见赠》诗中写道:

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常倾广座中。
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通篇是愧不敢当的意思,但颌联却透露出了王安石虽不敢“望韩”却有心“窥孟”的信息。有趣的是,千年来,王安石政治上的作为众说纷纭,评价不一,而在文学上的成就却是公认的。客观地说,无论作为政治家还是文学家,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留下了巨大的

足迹。当然，王安石不甘于只做一名文人，他要做一个大有作为的政治家，为国效力，建功立业，这是他素有的政治抱负。让我们来看看他走过的人生道路吧！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王安石出生于江西临江军之清江(今江西省清江县)，当时他的父亲王益任临江军判官。王益在故乡临川无田园以托生，游宦四方皆携眷而行。王安石随父到过韶州、汴京、江宁等地，因此对民间的世情风气、百姓的生活疾苦都有所了解。他闭户勤学，《宋史》本传称其“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忆昨诗示诸外弟》云：

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浅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稷是尧舜时的农官、周族的始祖，契是舜臣，助大禹治水有功，王安石立志要做稷、契那样的人，为社会做贡献。仁宗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进士及第，签书淮南判官，到扬州，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他结识了孙侔，并作《送孙正之序》。庆历三年(1043)，回临川省亲，拜访七年前在汴京相识的曾巩，怀着深厚的友情，写了《同学一首别

子固》。在家乡，有感于早先被人们夸奖不已的“神童”沦为庸人，遂有《伤仲永》之作。这一年，他还撰有《张刑部诗序》，抨击杨刘西昆体的靡丽，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观。

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调知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兴修水利，贷谷于民，小试身手，颇见佳绩。《鄞县经游记》叙述了他巡行县境、嘱民疏浚渠川的情况。知鄞三年，秩满离任，诏令赴阙俟试，王安石以家贫口众、难住京师为由，辞不就试。皇祐三年(1051)，被任命为舒州(治所在今安徽省潜山县)通判。仁宗至和元年(1054)，任满还京，途经高邮，结识了年轻的诗人王令，极力为之延誉。这一年夏天，他与朋友和弟弟一起游历了位于今安徽省含山县北的褒禅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游褒禅山记》。秋天，他被任命为群牧判官。仁宗嘉祐元年(1056)，王安石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翌年离京，赴常州知州任。嘉祐三年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赴饶州(今江西省波阳市)。嘉祐四年，诏令王安石直集贤院，不久，改任三司度支判官。

重返京都的王安石，在有了多年从中央到地方的从政经历之后，对社会现实越来越了解，也越来越感到不满和担忧。他把自己对时局的分析和变革的主张都写进一篇洋洋洒洒、长达万言的文章中，这就是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王安石认为，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当务之急是变法革新，而革新迫切需要人才。此后，王安石又写了著名的《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强调整顿财政为处于经济困窘中的国家所

急需,这有赖于完善法制,而法制则要依靠良吏去执行。两篇文章都阐述了同样的观点。仁宗没有采纳他的改革建议。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以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七年,同勾当三班院。政治上未能有所作为。

嘉祐八年(1063),母亲吴氏去世,王安石丁母忧,解官归江宁。此时好友王回亦不幸病逝,王安石极为悲痛,作了祭文,又写了墓志铭。居丧期间,王安石沉潜于学术,与友人、学生相切磋,如《答韩求仁书》探讨《诗经》与《周易》,《再答龚深父论语孟子书》阐述关于道德性命的见解。王安石的许多研究儒家经典以及论说自己哲学观点的学术文章可能都作于这一时期。为了培养后进、宣传自己的改革思想,王安石还收徒讲学,陆游的祖父陆佃就是王安石的学生。英宗治平四年(1067)王安石除丧,以知制诰出知江宁府,不久,为翰林学士。这一年,神宗皇帝登基,年轻的君主颇有革故鼎新的雄心,王安石终于迎来了在政坛上大显身手的时机。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越次入对,神宗咨以治国之道,王安石呈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揭示了表面太平之下所潜伏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吁请神宗切勿错过“大有为之时”,当机立断地实行变法。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厉行新法,朝野震动。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作《答司马谏议书》,驳斥司马光对变法的种种责难。年终,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新法的全面推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早年的知心朋友曾巩和自己的两个弟弟也没有

给予支持。虽然王安石力排众议，为刷新朝政做了许多工作，但在神宗流露出新法有所不便的想法之后，王安石便屡求解职。熙宁七年（1074），他得以罢相，出知江宁府。八年，又被神宗请回京都为相。是年，撰《诗》、《书》、《周礼》的《三经新义》，并颁于学官。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再度求退，终于辞去宰相一职，出判江宁府。熙宁年间，王安石全身心投入变法之中，除了写一些书信、墓志铭外，创作的散文很少。

罢相后，王安石退居钟山，营建半山园。脱离了紧张的政治活动而隐居田园，王安石的散文创作日见稀少，而诗歌却日益增多，思想上也由以儒学为主兼取佛老转向专门接受佛学的濡染以求解脱。当然，王安石依旧关心时事，还在修订《三经新义》，并且撰写了《字说》。神宗元丰七年（1084），苏轼在贬谪中由黄州移往汝州，过金陵，至钟山拜谒王安石，留连累日，二人唱和甚多。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任用司马光，尽废新法，令王安石至为惊讶伤感。哲宗元祐元年（1086），在疾病与忧愤交加之中，王安石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

王安石逝世后，苏轼奉命写了《王安石赠太傅制》。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苏轼，尽管遇到投机新法的势力的迫害，尽管对新法持有保留的态度，但仍然非常客观地给予王安石很高的评价：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
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

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时，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苏轼认为王安石是能做“非常之大事”的“希世之异人”，对其“瑰玮之文”、“卓绝之行”、丰富的学识、独立的见解褒赞有加，惜其功业未成而誉其淡于荣利。这些并非溢美之词，对于王安石来说，应该是受之无愧的。

二

以政治家自居、以“雄文造圣真”自期的王安石，崇经重道，反对西昆派文人绮靡的文风，反对使学者“迷其端原”的对形式的片面追求。在《上邵学士书》中王安石写道：“某尝悉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襍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香，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那么，王安石所认定的文究竟是什么呢？为文要具有什么作用呢？《上人书》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在这位政治家的眼中，文章的内容应与“礼教、治政”相关，为文应为政治服务，对社会有益。基于此，他以容器为喻，强调“以适用为

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简言之,内容应重于形式。在宋代古文运动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中,王安石的观点显然有其进步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仅仅把文章当作“礼教、治政”的载体,对内容的理解未免过于偏狭;器物最重要的是“适用”,“刻镂绘画”可有可无,形式很容易被忽视。在这样的文学观的指导下,总体上说,王安石的文章政治思想性和学术性较强,而形象性、文学性和艺术感染力较弱;议论之笔墨很多,而专门写景、叙事或抒情的较少。

“有补于世”的文学主张,也表现在王安石对诗歌的看法上。在唐代诗人中,王安石最敬重杜甫,因杜甫一饭未尝忘君,关心社稷与黎民百姓。而对李白的评价则远不如杜甫,因为李白诗中常写醇酒妇人。王安石编《四家诗》,排序为杜甫、欧阳修、韩愈、李白,也是从各人的政治成就上着眼。

客观地说,王安石散文的成就颇高,他的创作实践与文学主张不尽一致。他是十分注意对自己作品的锤炼的,所谓“词简而精,义深而明”(《上邵学士书》),“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等,正是其文学创作的写照。他以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众多作品,在散文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王安石在创作上求真求实,态度严谨,一丝不苟,不肯虚作应酬,不说空话假话。他所作的碑志文甚多,但从无“谀墓”之讥。应钱公辅的请求,为其母铭墓,钱公辅不满意,希望多说一些好话,被他断然回绝。哪怕长辈请他写文章,情面难却,不得不作,也不说应景的颂美的话。

如《抚州通判厅见山阁记》，因有“叔父之命”，“数辞不得”而作，也只把求记者抚州通判施某的话复述一番，敷衍成文，如此而已。

三

王安石早年为文，取法孟子和韩愈，雄肆奔放，经欧阳修指点后，取径渐广，文思开阔，兼取韩非的峭厉、荀子的谨严、扬雄的简古，而形成自己所特有的简劲峭拔的文风。着重从王安石的文学性散文予以观照，愚以为，其散文的艺术特色、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意新警不凡

作为一个颇有见地、勇于变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王安石在散文中时常表露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他的散文的简劲峭拔与其立意之新警明快有很大关系，因为平淡、凡庸的主旨是很难使文章峭拔起来的。

《游褒禅山记》告诉人们：“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本是写平常的游山入洞，由于作者赋予其深刻的耐人寻味的主旨，文章迥别于一般的游记，催人奋发，使人警醒，峭拔有力，不同凡响。又如《原过》以改过图新可为圣贤作为议论中心，《读柳宗元传》赞许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太古》称复古为倒退而“与禽兽朋”等等，非同寻常的立意，使文章充满了震慑人心的力量。

清初著名学者颜元在《习斋纪馀》中指出：“荆公之所

忧，皆司马、韩、范辈所不知忧者也；荆公之所见，皆周、程、张、邵辈所不及见也；荆公之所为，皆当时隐见诸书生所不肯为、不敢为、不能为者也。”正是由于卓尔不群的王安石具有众人所不及的深刻的见识，才有了在众多篇章中的新警不凡的立论，也才能孕育出那种峭拔刚健的独特风格。

（二）议论多而劲健

王安石散文之简练刚劲得力于作者对议论极其擅长，运用得也相当得体。以议论行叙事，文字简约而文风峭厉；多议论，文章劲健而不柔弱。

王安石的记叙文不以描绘生动、刻画精细见长，而是叙议结合，阐明道理，深有寓意。《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将有关题名的情况用一小段带过，而以主要的篇幅发议论，强调要“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抑制大地主、大商人之兼并，行文有力而中心突出。《伍子胥庙记》对于庙本身并没有多少具体描写，首段即是议论，称赞伍子胥报仇雪恨的坚韧毅力和振兴吴国的耿耿忠心；中间一段叙写过胥山周行庙庭的感慨和作记缘由；末段为抒怀的铭文。通篇将议论、叙事和抒情紧密结合在一起，但还是以议论为主，使文章显得矫健有力。《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纯然以议论行叙事，文字精练至极，亦刚劲至极，一个“忠而不阿”、“正而不苟”的无私无畏的言官形象挺拔地矗立在读者面前。《给事中赠尚书工部侍郎孔公墓志铭》的议论是由叙事纓带而出的。如叙过孔道辅谏阻废郭皇后而得罪之事后议论道：“盖公事君之大节如此。此其所以名闻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终于大

位，为天下惜者也。”描写了孔道辅举笏击蛇一事后又议论道：“然余观公数处朝廷大议，视祸福无所择，其智勇有过人者，胜一蛇之妖，何足道哉！”这样的议论，进一步渲染并强调突出了主人公的大节，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突出。茅坤推崇此篇文章说：“荆公第一首志铭。须看他顿挫纤徐，往往序事中伏议论，风神萧飒处。”（《唐宋八大家文钞·王文公文钞》卷十二）。

（三）文势凌厉急迫

王安石的散文凌厉雄迈，气势逼人。《答司马谏议书》严辞驳斥对新法的责难，抨击士大夫不恤国事、因循守旧的行径，表达了将变法进行到底的决心。篇末云：“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傲岸之气，喷涌而出。《读孟尝君传》不满百字，却逐层转折，步步紧逼，文势凌厉，气吞万里，被誉为“语语转，笔笔紧，千秋绝调”（清·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云：“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借助于顶针等修辞手段，文章展开环环相套、丝丝入扣的严密的论说，一股急迫的不能自己的气势油然而生。

以议论为主的文章刚劲有力，而抒情的笔墨亦蕴含着不凡的气势。《祭欧阳文忠公文》是当时所有祭欧阳修文中写得最好的一篇。由以天道难知而自失自悲，以欧公不朽而自宽自慰，写到欧公的“器质”、“智识”与“学

术”，此后更是文情奔泻，不可遏止：“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宏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通篇一气奔驰地抒写自己对欧阳修的敬重和思念，动人心魄，感人至深。

（四）构思巧而有变

王安石的散文结构严谨，没有枝蔓，文风劲健峭拔，但构思上却是刻意安排，极尽变化之能事。《游褒禅山记》先述见仆碑，再述游山洞，然后就游洞发议论，再就见碑抒感慨。整体上是先述后议：先述甲事乙事，后议乙事甲事。《芝阁记》追述真宗、仁宗两朝臣民对灵芝态度之不同，并加议论；后述陈君建阁藏灵芝之事，再发感慨。此文述乙事议乙事、再述甲事议甲事的结构与《游褒禅山记》完全不同。

《君子斋记》和《石门亭记》的结构亦迥然相异。《君子斋记》论君子应名实相符，洛阳主簿裴君命其斋曰“君子”，“思古人之所以为君子，而务及之”，“余嘉其志，而乐为道之”。层次井然，属线状结构。《石门亭记》写青田县石门亭集古今碑刻而作亭之意不明，然后从“好山乎”、“好观游眺望乎”、“于此问民之疾忧乎”、“燕闲以自休息于此乎”、“怜夫人之刻暴剥偃蹇而无所庇障，且泯灭乎”五个方面揣摩县令的作亭之意，并且都归结到一个“仁”字上，呈伞状结构，可谓别出心裁。

王安石的碑志文学习韩愈，相题设施，各具面目。梁启超评曰：“集中碑志之类殆二百篇，而结构无一同者。